

莫言新论

泓峻等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基金资助

n Xinlun

莫言新论

泓 峻、付甜甜、李小凡 著
赵军超、赵阶奎、朱丽君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言新论/泓峻等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396-5908-4

I. ①莫… II. ①泓… III. ①莫言-人物研究 ②莫言-小说研究 IV. ①K825.6 ②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8804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秦 雯

装帧设计:徐 睿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5714687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5 字数:300千字

版次: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导言 莫言研究的意义、空间与发展方向

一、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

2012年10月11日,北京时间19时,从瑞典皇家科学院传来一个令许多中国人振奋的消息: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于是,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在全世界具有最高知名度与最大影响力的文学奖项自1900年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籍作家。

在此之前,诺贝尔文学奖曾经是一个让中国作家爱恨交加,也让关心中国文学的每一个普通读者爱恨交加的奖项。多年来,关于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为大家津津乐道,其中包括鲁迅曾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老舍因去世而失去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等等。尤其是近10多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中国这样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世界大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辉煌的文学传统,产生过屈原、李白、汤显祖、曹雪芹的东方古国;这样一个在当今有着最庞大的专业作家与业余作家队伍,每年出版的长篇

小说以千部计^①，发表的诗歌篇数超过整个《全唐诗》^②的国度，在同是亚洲国家的印度、日本早有作家获奖的情况下，却始终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这件事既让人感到气馁，也让人感到愤愤不平。与此同时，许多真正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人也渐渐意识到，当今中国确实有一批作家的艺术水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不会完全忽视这么一支文学力量的存在。而诺贝尔文学奖永远让一个既有悠久文化传统又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占重要地位的东方大国缺席，其作为国际文学大奖的代表性本身恐怕也会受到置疑。

按照这种逻辑分析，中国当代作家问鼎诺贝尔文学奖是迟早的事情。于是，哪一位作家，在什么时间能成为第一个获得此奖的中国籍作家，就成为一个萦绕在许多人心头的十分诱人的悬念。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关于某某中国作家入围该奖提名的传闻一直没有停止过。而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开奖之日，人们在失望之余，都必然会引起一场关于中国作家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该奖是否公平、是否特别跟中国作家过不去，以及“诺贝尔文学奖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的大讨论。年复一年地重复同一种从希望到失望的情绪挫折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将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可能产生的影响力一步步抬升的过程。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漫长的等待作为铺垫，使得莫言获奖这一事件，立刻成为国内乃至整个华人圈的一条极具“爆炸性”的新闻。

尽管莫言此前曾经声称自己不打算为迎合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

① 2015 年 1 月 7 日发表在长沙《红网》上的一篇杂文《文艺 GDP 崇拜与 GDP 文艺》提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每年发表长篇小说突破 4000 部”。

② 这个数字是笔者在 10 年前一次学术会议上，从一位当代十分著名的文艺评论家的发言中获得的。

的任何奖项而写作；在得知自己获奖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曾十分淡定地讲，得不得这个奖自己无所谓，并不把它当成什么了不起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对于莫言本人的文学生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甚至对于在 20 世纪才生长起来的整个中国“新文学”而言，其产生的影响都绝对不会仅仅局限在短暂的新闻效应上。相反，它注定要成为一件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

在莫言获奖之后的这几年里，其对中国文学的意义已经充分地显现出来，而且这一事件的影响力还将在未来的若干年里持续下去。

具体地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对于莫言而言，就是一举奠定了其在中国当代文坛与世界文坛上不可动摇的文学大师的地位。由于诺贝尔文学奖至少在名义上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物色获奖对象的，而且一年最多选择一位作家，因此，此奖对于作家在其本国文学史上地位的显著提高，以及世界范围内知名度的扩大，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不可否认，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中，也有极个别像萨特那样在获奖之前就具有了很高的声望与知名度，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是对其成就与声望的一种“追认”的情况；但更多的情况则是，获奖者是在与国内国外水平与地位不相上下的众多作家激烈竞争中被“选拔”出来的。而一旦被“选拔”出来之后，其文学史地位便迅速地使得国内同时代的其他竞争者望尘莫及，而且从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作家”。

就莫言而论，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虽然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但与他基本齐名的作家，仅小说界就至少还有王蒙、贾平凹、闫连科、余华、王安忆、刘震云等十来个人。而在获奖之后，本土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一荣誉，使得莫言成就了其在“新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独特地位。而且，这一地位之崇高，在 20 世纪后半段成长起

来的这一批作家当中,恐怕已经很难有人再出其右。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另外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增强了人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信心。

进入 21 世纪之后,中国当代文学中存在着许多两极化的现象。比如,一方面是从事文学写作的作者队伍不断壮大,进入体制的专业作家有增无减,出产作品的数量更是急速增加;另一方面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化与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却日趋边缘化,读者群持续收缩。一方面是“鬼吹灯”“穿越”“戏说”之风在“新生代”作家与读者中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又有人在推崇与实践以“事实”“亲历”和“诚实原则”为基本特征的“非虚构写作”。一方面来自政府、民间、国内、国际的文学奖项层出不穷,由媒体或出版社组织的专家、读者对“文学大师”的推举与排名也不时吸引人们的眼球;另一方面,当代文坛却是群龙无首,没有出现类似鲁迅那样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坛领袖人物,经典作家与作品的序列也始终无法建立起来。

与以上诸种矛盾现象相关的当代中国文坛上最引人注目的两极化现象,就是近些年来人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一方面,有学者宣称“新时期文学这 30 年应该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为繁荣的 30 年,我甚至认为这 30 年的文学成就要超过现代文学的 30 年(1919—1949)”^①;另一方面,有学者则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与价值表现出极大的怀疑,评价偏于负面。而负面评价之中最典型的就是德国汉学家

^① 吴义勤 2008 年接受读者访谈时表达的观点,见《这个三十年超过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国文学网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52319>。

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

中国当代作家一直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实际上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持负面评论者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从作家到批评家再到读者,许多人心中深深的“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也是急于想通过这一世界公认的权威文学奖项,去证明中国当代文学在当今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分量,提升国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信心,抑制那些对中国当代文学评价过于负面的观点的蔓延。因此,莫言的获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它从根本上缓解了人们长期以来因总是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而产生的巨大心理压力,在很大程度上驱散了笼罩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空的悲观主义的阴云。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当代文坛的积极效应,还包括它极大地增强了其他正处在创作高峰期的作家的自信心,激发了他们创作的热情。有人说,莫言获奖之后,若干年内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名单中,也许很难再见到中国作家的名字,与他同代的不少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之梦”也许因此会受到很大打击。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不仅证明了莫言一个人的文学写作水平,还证明了一批原先与莫言在文学地位上不相上下的中国作家的写作水平。因此,得知莫言获奖的消息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莫言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文学和作家的关注,表明中国当代作家几十年不倦的实践和努力,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这对今后的中国文学引起国际上更多读者的关注、研究、了解和兴趣,以及中外文学交流,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莫言的获奖,

也表明了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①

如果说作为作协主席的铁凝这段话中表达的意思还比较含蓄的话,其他一些作家的表达则要直接一些。陈忠实说:“莫言获奖不仅是他的光荣,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光荣,标志着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已经进入世界诺贝尔文学光环的系列。它不仅是对莫言创作成就的褒奖,也是对中国文学的褒奖。”刘震云更是讲:“莫言给诺贝尔文学奖带来了一些东西,并不是一个馅饼砸在莫言的头上。我觉得莫言写得很好,当然,同时代的一些作家也写得挺好。”^②

可以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历史性事件,不仅改变了他自己,也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坛。莫言这个名字,因此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代表性符号、一面鲜艳的旗帜。

二、莫言的创作之路及其与莫言研究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莫言是一个十分勤奋多产的作家。据我们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初踏上文坛到2015年6月,35年的时间里,莫言共创作了长篇小说11部、中篇小说37部、短篇小说74篇、戏剧2部、散文69篇。^③

① 来自作家朋友的衷心祝贺[N].文艺报,2012-10-12.

② 来自作家朋友的衷心祝贺[N].文艺报,2012-10-12.

③ 统计数据参考了张书群的《莫言创作的经典化问题研究》、李桂玲的《莫言文学年谱》及范晓玲的《莫言作品及研究文献目录汇编:1981—2013》等资料。

据莫言自己讲,他的文学创作之路起于 1979 年在河北保定某部服役的时候,但最初大约有 2 年的时间,投稿都以失败告终。^① 1981 年,在他 26 岁时,终于接到杂志社的用稿通知,莫言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该作品发表在河北保定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莲池》第 5 期上。莫言之后的几篇小说《丑兵》《售棉大路》《民间音乐》等,也都刊载在这家市级文联主办的刊物之上。这一时期的莫言,只能算一个文学青年。

1984 年起,莫言开始在《解放军文艺》《钟山》等比较重要的文学期刊上发表小说,发表之后引起的反响仍然平淡。但是,就在这一年,莫言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成为该系成立以来的首届学生。此事对莫言之后的文学生涯影响甚大。在这里,莫言接触到福克纳、马尔克斯等许多国外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创作风格有了很大的改变。1985 年,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在中国作家协会刚创刊不久的文学期刊《中国作家》上发表。这篇小说新颖的现代主义手法,对人物丰富而奇特的感观世界的呈现,终于引起了文坛很大的关注。因此,《透明的红萝卜》被认为是莫言的成名之作。1986 年 3 月,莫言在当时国内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人民文学》第 3 期上推出他新的力作——中篇小说《红高粱》。这部作品发表后反响强烈,并在 1987 年获得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1985—1986)。《红高粱》的成功,基本奠定了莫言青年作家的地位。而之后不久在这篇小说基础上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得第 38 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使得莫言的知名度超出了文学的圈子,

^① 莫言. 从《莲池》到《湖海》[M]. 莫言散文.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167.

他在文坛上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

然而,莫言的创作道路并不平坦。到了1987年,他的2部小说《红蝗》和《欢乐》受到了激烈的批评。此后创作的2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无论在读者中,还是在评论家中,也都反响平平。20世纪90年代初创作的长篇小说《酒国》最初甚至在大陆没有找到出版或发表的机会,不得不在台湾首先出版。加上另外一些事情的干扰,莫言的文学创作因此进入一个比较困难、比较沉寂的时期。

莫言再一次引起当代文坛的强烈关注,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年,《丰乳肥臀》这部长篇小说的发表,虽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莫言却通过这部作品向世人展示出了文学大家的非凡气度。而且,这部作品也标志着莫言在经过深刻反思之后创作风格的明显转变——现代主义的实验色彩有所淡化,小说的故事性增强,作家开始把主要精力用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之上,人物形象显得十分鲜明。而且其大跨度的时间、众多的人物形象,尤其是20世纪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在小说中的呈现,使这部作品体现出雄浑的史诗风格。此后的10来年时间里,他的《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相继问世,且都在文坛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90年代中期以后的这批作品,与80年代中期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等作品一起奠定了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小说大家的地位。因此,当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在中国作家中选中莫言的时候,并不使大家感到特别意外。

莫言的成功,首先与其本人卓越的文学才能有关,但同时也得益于许多外在因素的促进。其中,莫言研究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据我们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6月中旬,国内期刊上发表的关于莫言的研究文章超过2000篇,围绕莫言及其作品出版的著作近50部。

这些文章及著作,有关于莫言作品主题意蕴、叙事特色、人物系列、语言风格、文体特征、艺术特质的“内部研究”,也有关于作家生平、影响作家文学审美观念的文化因素等“外部研究”,对莫言及其作品有着全方位的研究与解读。可以说莫言研究与莫言的文学创作一路相伴,对莫言的文学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被认为是莫言成名之作的《透明的红萝卜》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够使莫言一举成名,其中就有评论家的功劳所在。首先,发表这篇作品的《中国作家》编辑部在发表之前为该篇作品专门开了一个研讨会,并将研讨会纪要以“有追求才有特色”为题与小说一起发表。关于小说发表前的那场作品研讨会,莫言日后曾这样回忆说:

北京的评论家大多数都去了。尽管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争论,还是对把我推向文坛起到了重要作用。紧接着很多报纸、杂志发出这次研讨会的消息。这篇小说的成功增强了我的信心,使我意识到原来这就是好小说。接下来很快就出来了一批,像《爆炸》《筑路》《秋水》《三匹马》……都是这个时期写的。^①

实际上,评论家们不仅在那次研讨会上对这篇小说发表了令莫言印象深刻的意见,而且在作品发表之后,评论界对这篇小说也极为关注。据统计,1985—1986年关于此篇作品的评论高达80余篇。^②其中有些评论对莫言小说中超现实的因素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并认为这是

① 莫言. 碎语文学[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23.

② 李桂玲. 莫言文学年谱(上)[J]. 东吴学术,2014(1).

对以六朝志怪、唐传奇、《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继承^①；有些评论则对莫言在这篇作品中塑造的具有超乎常人的感觉能力的黑孩这一人物对于当代文学的意义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更有评论把莫言的这篇作品和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的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创作相提并论，称莫言为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正是这些评论，使莫言找到了创作的方向，极大地鼓舞了他创作的信心。

莫言在创作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很在乎批评家的反应的。其 1985 年、1986 年发表的引起极大关注与好评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爆炸》等都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这些作品的成功，进一步鼓励了他沿着现代主义之路进行探索实验的雄心。这种创作取向，不能不说与批评家的鼓励有直接的关系。其 1987 年发表的 2 部作品《欢乐》与《红蝗》，包括 1988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十三步》，里面经常出现对人物潜意识心理的冗长的描写，大段大段逻辑混乱的内心独白，这显然与其创作的现代主义取向直接相关。正是这些作品中过于浓烈的现代主义因素，使它们显得十分晦涩难读。

1985 和 1986 这 2 个年度是莫言获得巨大成功的 2 年，然而 1987 年小说《欢乐》《红蝗》的发表，却受到恶评。这对莫言而言是始料未及的。如果说《欢乐》与《红蝗》还因为尖锐的批评而引起一定关注的话，到 1988 年，当《十三步》《天堂蒜薹之歌》2 部长篇小说问世时，评论界几乎无人再去关注。这种状况使莫言感到十分气馁。他之后一段时间相对沉寂，以及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由《丰乳肥臀》这部作品所体现

① 李陀. 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N]. 文艺报, 1985-7-6.

出的创作的转向,与此有直接关系。

贯穿莫言多部作品的一些创作主题,如“种的退化”“忏悔意识”等,也大都是在作家与评论家的互动中形成与展开的。比如,“种的退化”这一主题在他 20 世纪 80 年代创作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中,20 世纪 90 年代创作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中,以及 21 世纪创作的《生死疲劳》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我们发现,莫言在他发表于 1986 年 1 月的小说《红高粱》中,第一次提到了“种的退化”问题。之后,在 1986—1987 年 2 年间,包括雷达、季红真、樊星这样的著名评论家在内,许多人在自己的评论文章中都对莫言小说的这一主题进行了发掘、阐释与肯定,使这一主题彰显出来。评论家们对这一主题的发掘、阐释与肯定,一方面影响了电影《红高粱》对这一主题的进一步表达,另一方面也鼓励了莫言在以后的创作中不断回到这一主题上来。莫言在自己的作品中对这一主题的不断强调,又引起了评论家进一步结合莫言的创作探讨这一主题的兴趣。这种评论界与作家之间的互动,是文学史上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其实,对于文学批评,莫言不只是希望听到肯定的声音。他曾经说:

有很多尖锐的批评,这个也很正常。如果一个小说出来,众口一词,众口称誉,这未必是件好事,有点意思的东西必然是毁誉参半的。有五个人说坏,有五个人说好就是一个最佳状态。^①

① 莫言. 碎语文学[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62.

而莫言的作品也的确常常引起广泛的争议,甚至是激烈的批评。

莫言在创作过程中,曾经有两次引发了评论界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激烈批评。一次是在1988年,围绕他前一年发表的《欢乐》与《红蝗》的批评,一次是在1996年围绕《丰乳肥臀》的批评。1988年那一次比较有影响的批评文章包括王干的《反文化的失败——莫言近期小说批判》(《读书》,1988年第10期),贺绍俊、潘凯雄的《毫无节制的〈红蝗〉》(《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1期),夏志厚的《红色的变异——从〈透明的红萝卜〉到〈红蝗〉》(《上海文论》,1988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主要针对的是莫言上述作品中过分的自然主义的描写、不加克制的情绪宣泄,以及情节失真、堆砌等。1996年那一次,一些评论家甚至从道德、政治、历史观等角度入手,对莫言前一年刚问世的小说《丰乳肥臀》进行了“上纲上线”的严厉批评,其火药味之浓,用莫言的话讲,让他心里“很不痛快,感觉到自己有口难辩”,“对这帮人不正当的手段很愤怒”。莫言因此而承受了很大压力,要求出版社停印甚至销毁这部作品。

在这段艰难的时期,也有一些评论家站出来为他“打抱不平”,这对莫言重新确立对自己作品的信心有很大的帮助。比如,1988年对《欢乐》与《红蝗》过分激烈的批判引起了评论界的反弹,于是,1989年,又出现了几篇肯定莫言相关作品的文章,如周政保、韩子勇的文章《莫言小说的褻渎意识》(《小说评论》,1989年第1期),丁帆的文章《褻渎的神话和〈红蝗〉的意义》(《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李运抃的文章《论近年小说对人自身丑陋的审视》(《小说评论》,1989年第2期),丁帆、徐兆淮的文章《向现代悲剧逼近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6期)等。周政保、韩子勇的文章认为,莫言这些小说中的“反文化”色彩是一种“合理的意欲发泄”“适度的戏谑调侃”,它们

“构成了莫言小说向充满污浊的传统社会及其不可告人的文化情结挑战的艺术方式”。丁帆的文章则认为莫言的相关小说“打破了传统的审美定势,企图以一种褻渎的姿态,促进人们审美心理的演变递嬗”。在《丰乳肥臀》这部小说遭到不公正的批判时,也有一些评论家如张清华、邓晓芒、张军、毕光明等人,在自己的批评文章中,对作品进行了冷静认真的细读,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几年后,莫言在自己的访谈中谈到了这些批评家的文章,并说自己因此感到十分欣慰,对这部小说又恢复了信心。^①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的作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颇有创新性和挑战性,这也就使得对于他的作品的评价总是伴随着不同的声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引起了更多读者对他的作品进行阅读的兴趣,提高了他的知名度。另一方面,面对批评的声音的时候,莫言实际上也在不断地进行反思与调整。反对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激发莫言不断进行新的探索的一种动力。

三、莫言作品的丰富性为莫言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自从进入文坛以来,被批评家持续关注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关注的程度也是比较高的,这与莫言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创造性、思想内涵具有比较大的阐释空间有关。30多年来,一方面,如上文所言,莫言研究对莫言本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莫言也以其丰富的创作实践为文学批评家提供了可资研究的理

① 莫言.碎语文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58.

想文本。

莫言之所以能够引起批评家长时间高强度的关注,首先是因为他自己在文学创作中不断地追求变化。可以说,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是最“擅变”的一位作家,无论是从小说技术层面,还是从写作题材和作品思想内容方面,30多年来,莫言自始至终都在积极地进行新的尝试,追求新的变化,既不刻意地重复别人,也不故步自封地重复自己。这使得他的许多作品诞生之后,总能产生比较强烈的陌生化效果,甚至给研究者的解读与批评带来很大的挑战。

莫言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名的。此时,中国文学正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开始积极地探索文学写作的新形式。1985年,除莫言发表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外,当年引起人们关注的其他人的小说作品还包括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上海文学》,1985年第2期),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人民文学》,1985年第3期)和《蓝天绿海》(《上海文学》,1985年第6期),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韩少功的《爸爸爸》(《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王安忆的《小鲍庄》(《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残雪的《山上的小屋》(《人民文学》,1985年第8期)。这些作品中,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被文学史家认为是“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被认为是“以形式为内容”的“先锋小说”,这种小说据说直接受到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影响。至于刘索拉、徐星、残雪的小说,更是被当时的评论家直接称为中国的黑色幽默文学、中国的存在主义文学。莫言的这篇小说连同他之后发表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则被评论家们称为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氛围对莫言创作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